

范成大纪游诗文简论

徐 立

范成大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生于南宋多事之秋,其诗文行迹以爱国抗金、关心民生疾苦为后世称道。在文学发展史上,他以揭露当时腐政、社会弊端及清新、恬静的田园诗而与尤袤、杨万里、陆游三家雄踞南宋诗坛。然而,贯穿他整个仕宦生涯,使他在历史、文学史、古代科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纪游诗文却鲜为人谈及。他自我总结:“余生东吴,而北抚幽蓟,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①可称为“东南西北人”。本文拟就记录他行迹的《揽髻录》、《骖鸾录》、《吴船录》及抚北、使南、帅西所作诗歌作一些探讨,使学界对范成大的认识更为全面。

(一)

范成大生活的年代,正值南宋国事艰难之际。他“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②,可在这以前就树立了报效国家、抗金救国的宏愿。其《读史三首》之二写道:“堂堂列传冠元功,纸上浮云万事空。我若材堪当世用,他年应只拟诸公。”^③乾道四年(1168)范成大知处州,这便为他施展抱负提供了天地,他领导州民兴修水利,“民食其利”^④。就封建士大夫而言,为政清廉、为民谋利固然是不错的,但也不算上头等功绩,范成大作为南宋一代名臣,突出的政治表现还在乾道六年(1170)北上使金一事。

绍兴九年(1139)宋金议和,金国仗恃兵力强盛,胁迫宋朝在交往中施以“属臣”之礼,居然为宋王朝所接受。时隔二十五年,隆兴二年(1164)再度议和时,南宋请求金国改君臣属国为“叔姪之国”,不以属臣之礼交往。虽然这纯属自欺欺人的“抗争”,但在当时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使命。金宋之间,实力十分悬殊,宋无抗争的实力,加之金国属异族入侵中原,以武力、野蛮征服文明,本无道理可言,故使金之行,是要冒生死风险的。《宋史·范成大传》载:“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至是虞允文议遣使,上问:‘谁可使者?’允文荐李焘及成大。退以语焘,焘曰:‘今往敌,必不从;不从,必以死争之,是丞相杀焘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范成大并非不清楚此行的风险。行前孝宗皇帝曾召他询问此事。“范曰:‘无故泛使,近于求衅,不执则戮,臣以立后,仍区处家事,为不还计,心甚安之。’”^⑤可见范成大是打定主意一腔碧血报效国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李焘的行为与之相比,不啻霄壤之别。

《揽髻录》及纪行绝句七十二首,便是记载范成大此行见闻感触的最好材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范成大当时的思想活动轨迹。

《揽髻录》所记乃自临安出使金国中都之事。作者行进在中原大地上,但见满目疮痍,四野荒

凉，山河破碎，骨肉同胞备受欺凌，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范成大的心灵。他在《汴河》一诗的小序中写道：“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土人云：‘本朝恢复驾回，即河须复开。’”汴河本是京城开封通往南方之大动脉，而今干涸，河床长满杂草，昔日繁华似锦景象，已荡然不存，故“土人”口中流露出对故国的强烈的思念缅怀之情。对此，范成大唯有用诗歌抒发满腹情怀：“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还京却要东南运，酸枣棠梨莫翦然。”一个“枯”字，使全诗笼罩着强烈的悲怆气氛；而“早晚”一词，是说何时鸾驾回京，他本人也十分茫然。这首写汴河的小诗，实际上是从汴河漕运的兴衰缩写出北宋、南宋两代的兴衰，感情异常深沉、悲痛。

愈往北走，触目皆是战乱留下的创伤。《揽辔录》记载：“丁卯，过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二里至东京（今开封），金改为南京。入新宋门即朝阳门也，金改曰宏仁门，弥望悉荒墟。”昔日御花园成了今天的颓垣荒草，故在《宜春苑》一诗中沉痛地抒发了内心的悲愤之情：“狐豕糞蹊满路隅，行人犹作御园呼。连昌尚有花临砌，肠断宜春寸草无。”翻开《揽辔录》，处处血和泪。亡国的人民在生活上、思想上所遭受的双重压迫，引起范成大深切的同情。《揽辔录》载：“入都亭驿歇泊，旧京自城破后，创痍不复，……民间荒残，自若新域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布肆皆苟活而已。”范成大作为南宋使者，看到这些，怎能不“忍泪失声”，而“长与都人作泪垂”呢？

古往今来，战争的胜负都是建筑在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之上的，但无数战死沙场的士卒却抛尸荒野，白骨露天，无人掩埋。在抗金战斗中，同样有许多浴血奋战的兵士为抗击侵略者而付出了生命，而今情景又是如何呢？《宿州》一诗写道：“狐鸣鬼啸夜茫茫，元是官军旧战场。土伯不能藏碧磷，三三两两照前冈。”在一派阴风惨惨，狐鸣鬼号的背后，诗人对死难将士的怜悯心情自不待说，可这旧战场的惨状，不由人不想到将士们浴血奋战的成果，却被赵构一伙轻易断送，从中含蓄而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统治者的卖国殃民行径。

前面说过，对于此次使金，范成大是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经过蔺相如墓前所作绝句，便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实表露：“玉节径行虏障深，马头洒洒莫疏林。兹行壁重身如叶，天日应临慕蔺心。”后来金庭上书，范成大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思想行为得到了充分表现。《宋史》本传载：“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姪，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邪？’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难怪《宋史》本传论曰：“成大致书北庭，几于见杀，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风烈，孔子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者欤？”

范成大纪行诗文中暴露当时社会腐败的地方也有不少，足见其拯世救民、体恤民生的社会责任感，如《骖鸾录》等均有所载，今不赘。

（二）

中国的游记文学可以上溯到先秦时的《穆天子传》及一些神话传说，成型的可算《水经》及郦道元的《水经注》。南北朝时期，以谢灵运、陶渊明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将山水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为当时文坛注入了一股自然清新的风气。至唐宋时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撰写游记，则多是一景一记，固然非常精采，惜其场面不够宏大。而范成大的《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则把大半个中国都写进去了，为后人留下了宋时中国山川风物的宝贵史料，也为中国游记文学注入了新内容，增添了不少新的特色。

大自然神工鬼斧塑造的无数杰作,以其千姿百态存于世间,不知千百万年了。然而,只有当其美为人类所发现、欣赏之后,才具有了美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同时,还需要具有文学天赋的作家运用审美意识去观赏它,并将其美的特征付诸笔端,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欣赏接受。范成大的纪游诗文正是把亲身经历的名山大川之美用流畅优美的文字描叙出来,使人读后仿佛与他一道融进了大自然的怀抱,享受到自然美的无尽快感。

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帅广西,从湖州出发,经江西、湖南入桂。水陆千里,舟车并行,凡名胜古迹、大川峻岭无不登临游览。翻开《骖鸾录》,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全是绮丽秀美的南国风光。如《骖鸾录》描写雪景:“三十日发富阳,雪满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霁,风急寒甚,披使金时所作绵袍,戴毡帽,坐船头纵观,不胜清绝。剡溪夜泛,景物未必过此。”这独特的江南雪景,使人感受到天地间那幽渺、深沉的阴柔之美。而范成大离蜀归乡所作《吴船录》描写嘉州一段,则展示了一种雄壮、奔放的阳刚之美:“嘉为众水之会,导江,沫水与岷江皆合于山下,南流以下犍为。沫水合大渡河由雅州而来,直捣山壁,滩洄险恶,号舟楫至危之地。”《吴船录》又载:淳熙四年(1177)八月十五日泊舟武昌,登黄鹤楼。是夜“轮奂高寒,甲于湖外,……天无纤云,月色奇甚,江面如练,空水吞吐,平生所遇中秋佳月似夕亦有数。”这段对中秋月夜的描写可称绝妙,实可与陆游《入蜀记》写中秋月对照着读。而成大之写月,带着浓厚的游子思乡之情,诚如他自己说:从乾道元年(1165)至淳熙四年的十三年中,宦迹南北东西,“其间相去或万里,不胜漂泊之叹。……通计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亦可以谓之游子”,随后逐年记载了这十一处度中秋的地点^⑥。透过这平淡似水的记录,我们可以感受到范成大游记文中表现出的对故土蕴含着的深厚感情。

范成大纪游诗文不仅注重对山水景物的描绘,而且往往蕴藉着深沉的历史感叹。如《吴船录》载:“巳未,泊归州。峡路州郡皆荒凉,未有若归之甚者。满目皆茅茨,唯州宅虽有盖瓦,缘江负山,逼仄无平地。”那时的秭归县由于交通堵塞,地僻荒凉,几于不毛之地。但屈原、宋玉,王昭君都出生在这里,使成大异常感慨:“余尝论归为州僻陋,为西蜀之最。而男子有屈、宋,女子有昭君,……”^⑦《嘲峡石》诗亦云:“或云峡多材,奇秀郁以积。绝代昭君材,惊世屈原宅。”这决非空泛的惊叹,因为如屈原、王昭君名垂青史,被后人怀念,可知历史是严肃而又公允的;而几许王侯将相,则皆如同过眼云烟而已!

范成大的纪游诗文,不仅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还具有史料价值。仅举二例:《揽辔录》载:“桥北驰道出西御廊门,过交钞处。交钞所者,金本无钱,唯杨王亮尝一铸正隆钱,绝不多,余悉用中国旧钱。又不欲留钱于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钱,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这是当时宋金边境货币流通情况的记载以及金朝铸币的状况。后面又详记当时这种货币的文字、花纹、图案,以及交钱与中原铜钱的兑换比值。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它对研究宋金经济史、中国货币史的价值。又,《吴船录》载,范成大游峨眉牛心寺时,见该寺所藏涅槃经四十二卷后面抄录的继业三藏入天竺求舍利、贝叶经的历程的材料:“业姓王氏,耀州人,隶东京天寿院。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至天宝九年始归寺。”流水账一般记在经卷后面的西行路线,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唐代中国与西亚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画卷。沿途的山川河流、寺庙浮图、民俗风情等,一一有载。这一类佛教方面的史事,往往史书有阙。范成大将这些文字抄录下来,颇有史家眼光。诚如他所说:“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以备国史之缺。”

(三)

范成大的纪游诗文在自然地理方面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需要在此专门讨论和评述。

自公元1170年至1177年,范成大三次远游,先后到过今浙江、江苏、河南、河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湖北、广西等地,足迹几遍半个中国,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游历可谓广矣。前后七、八年的旅途奔波,并未影响范成大辛勤的创作活动。到1177年以后他在浙江安定下来时,已给后人留下了感情激荡的纪游诗文以及严谨丰富的地理著作,值得我们重视。

《吴船录》“新滩”一段写道:“三十里至新滩,此滩恶名豪三峡。汉晋时山再崩塞江,所以名新滩。”新滩是三峡中至险的一段,“石乱水汹,瞬息覆溺”。显然这是汉晋时长江两岸滑坡堵塞江道的后遗症。汉晋距今已一千七八百年,1985年三峡又出现大滑坡,通过历史上代代相传的记载可以从分析巫山断裂带大滑坡的运动周期。又,巫山地形奇特峻峭,是历代画家笔下经常摹写的对象,但艺术品绝不能代替科学的和真实的地图。《吴船录》载:“世传巫山图皆非是,虽夔府官廨中所画亦不类。余令画史以小舸泛中流摹写,始得形似。今好事者所藏,举不若余图之真也。”范氏令画史所画巫山图,可以看作是巫山地貌的一幅早期地图。范成大对气候现象也十分关注,在纪游文中留下了这方面的宝贵记载。《揽辔录》载:乾道六年(1170)农历九月初六(公历10月17日),金中都(今北京)曾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据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说:“查现代的记载,北京平均初雪是11月25日,最早初雪是11月9日,最迟初雪为12月15日。”《揽辔录》中的这段记载无疑对研究气候变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如:1177年农历五月范成大离成都去峨眉,“初衣暑绉”,完全是夏日装束;“渐高渐寒,到八十四盘则骤寒,比及山顶亟挟行两重”,这已是深秋衣着;再走,“又加毳衲驼茸之裘,尽衣箬中所藏,系重中蹶毡靴犹凜栗不自持,则炽炭拥炉”,这完全是严冬气候。山地气候的垂直分布在他的笔下形象而生动地表现出来了。后面他又写了下山时愈走愈热,逐渐减衣,回复到暑热之中的情形^⑥。这段描述虽然没有使用气象学的专门术语,但出现在七百多年前古人游记之中确是少见的。

此外,他对植物分布的观察也是很仔细,《吴船录》记:“娑罗者,其木叶如海桐又似杨梅,花红白色,春夏间开,惟此山有之。初登山即见之,至此满山皆是。”可见娑罗树生长在海拔1500公尺左右,属寒温带植物。又记:“余来以季夏,数日前雪大降,木叶犹有雪渍烂斑之迹。”由于高山气候导致了“草叶之异者,亦不可胜数。山高多风,木不能长,枝悉下垂,古苔如乱发^{髣髴}挂木上,……又有塔松,状似杉而叶园细,亦不能高。”娑罗罕见,苔藓和塔松是典型的寒带植物。而且他以直观感受,朴素而简明地解释了山高树矮的现象,结论基本正确,由此我们也可以略观那时峨眉山植被分布的大概情况。再如他对峨眉山“佛光”的观察,认识到佛光要出现,必须先有:“兜罗锦云”密布,这是在峨眉山特殊地形、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含水蒸气很重的云朵;同时他感到“雨点有余飞”。尽管他未使用光折射的术语解释佛光现象,但他推断“大略如吴江垂虹”,已接近事实的核心了。这一结论与民间流传的有慧根的人才能见到佛光的说法相比,更见其科学性。再如他帅广西时,对石灰岩溶洞的考察,也是对喀斯特地貌的认识,对中国古代地理学也有一定贡献。

七年的游历在范成大大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他自二十八岁中进士后,到六十八岁的四十年中主要是从政为官。不论是游历途中所见所闻,还是作地方官,他对经济地理、农田水利等也都十分重视,这在《吴船录》、《桂海虞衡志》等书中均有反映,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他纪游文这方面的

内容。如《吴船录》中对武昌的描述：“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闹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宋时的武昌已具商业大都市的规模。他还分析其原因，认为武昌的繁华“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他的观察是准确的。武昌本处于全国中心，九衢通会，南来北往，水陆两便，地理优势决定了其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之一，商品流通也促进了城市的加速发展。又，《骊鸾录》也写道：“二日宿储州市，又当舍與浙江。此地既为舟车更易之冲，客旅之所盘泊，故交易甚夥，敌壮县。”其时湖南株州仅为一集市，但由于是商旅水陆转运点，交易频繁，能敌上一个大县。它如对南岳集市的描述，也可以看到范成大对都市兴盛与交通、商品交流的密切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他还特别关注当时手工业生产的情况，如《骊鸾录》记载湖南醴陵“县出方响铁，工家比屋礲然，其法以岁久铛铁为胜，常以善价买之，甚破碎者亦入用。”另外如对四川郫县筒酒的造法、浙江兰溪酿酒业、四川乐温的蒲墨生产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向我们展示了南宋社会的经济状况，为今天研究宋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吴船录》又载：“离堆者，李太守凿岩中断，分江水一派入永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以至成都。……庙前近离堆累石子作长汀以遏水，号象鼻，以形似名。西川夏旱，支江水涸，即遣使致祷，增堰壅水以入支江，三四宿水即遍，涸之摄水。”成都都江堰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一创举千百年来保证了成都平原的农业丰收，当然也引起了范成大的高度重视。又，《骊鸾录》载：“两日来，带江悉是桔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绝。林中竹篱瓦屋，不类村墟，疑皆得种桔之利。”他从连绵不断的桔林看到桔园主人与一船农户居住条件不同，进而推测是靠了桔林致富，并引司马迁《货殖列传》的经济观点作结，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赞许，从中可以看出范成大纪游文中的经济地理内容，这在古人游记文中尤其是少见的和可贵的。

注释：

①见《桂海虞衡志》。

⑤岳珂《程史》。

②④见《宋史》本传。

⑥⑦⑧见《吴船录》。

③见《石湖诗集》卷 2。

(上接 63 页)

综合这三条分析第二组、第三组实例。可以看出第二组各例都不是问句，句末不应用问号。①、②、③、⑤各例中的问号应改为句号；④中的问号应改为逗号；⑥中的第一个问号改为逗号，第二个问号改为句号。与第二组相反，第三组各例中的含疑问的短语都具有提问的功能，①要求学生就“怎样”作出回答，②要求学生就“是”与“不是”选择作出回答。①全句是特指问疑问句，句末的句号改为问号；②中的第二个句子是正反问疑问句，句末的句号改为问号。

注释

①新编内地版《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中语文课本》(实验本)，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6 月出版。以下所引初中语文课本同此。

②见张静《汉语语法问题》